

下冊

贵州省志

# 民族志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GUIZHOU  
SHENGZHI  
MINZUZHI

贵州民族出版社

# 贵州省志

民族志

下册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 第六篇 仡佬族

### 第一章 族源与族称

#### 第一节 族 源

商周时期,我国南方有一种被称为“濮”的古族群,因其分布辽阔,人口众多,而有“百濮”之称。伊尹的“四方令”里即已提及:“正南:甄、邓、桂国、损子、百濮、九菌。”武王发纣推翻商王朝统治后,于成周大会诸侯及“四夷”,西南地区的濮人曾以特产丹砂前往朝贺。《逸周书·王会》载,“卜人以丹砂”,孔晁注:“卜人,西南之蛮也”,“卜即濮也”。另一种使用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的古族群为“越”,他们散布在东南沿海及今广西一带,人们泛称为“百越”。春秋战国时,广西境内的部分越人,溯水北上西进,移入西南地区,与濮人杂错而居,人口渐繁,以致《华阳国志·南中志》误认为,“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杂居于西南地区的濮人、越人生活习俗互相影响渗透的部分,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族群——“僚”(“僚”原写作“獠”,作为族称当读作“佬”)。战国时期即有“僚”人出现。《华阳国志·蜀志》载,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獠”。汉代的僚人已是夜郎国的主体居民。唐初,僚人中的一部分发展为单一民族——“仡佬”。《六祖坛经·行由品》载慧能法师语:“汝是岭南人,又是葛僚,若为堪作佛。”《元和郡县志》卷三十载,洛浦县“甚险固,仡僚反乱,居人皆保其土”。宋《溪蛮丛笑》始写作“仡佬”。

南朝《水经注·温水》载,“遂雄夷濮”的夜郎承袭者于汉武帝时被杀,引起“夷僚成怨”,明确僚人是由濮人演变而成。彝族先民与仡佬族的先民接触较早,确知濮人是仡佬族的先民,《平远州志·艺文志》载,彝族民间“依仿先朝旧制:满三年一普夥。普谓称仡佬,夥谓祭献”。“普”即濮人。彝语为谓语后置,普夥意为祭仡佬族的先祖濮人。至今彝语仍呼仡佬为濮,呼仡佬族的发祥地北盘江为“濮吐诸衣”,意为仡佬族开凿的河流。元《异域志·僚人》谓,“僚……有打牙者,为打牙葛僚”。(明嘉靖)《贵州通志》谓,“古称僚,一曰倮佬”,确指仡佬族系从僚人中分化出来的。濮人和僚人相继是仡佬族先民。

贵州各族公认仡佬族是贵州最古老的民族。安顺地区称为“古族”,遵义地区呼之为“古老户”。农村广泛流传有“蛮夷仡佬,开荒辟草”之语。吃新节时,仡佬族人可在村

寨附近他族人的田地里摘取谷物祭祖,不遭斥阻。人死送葬,不丢买路钱。这些都反映出人们对仡佬族先民濮人、僚人开发贵州高原历史功绩的缅怀与崇敬。

## 第二节 族 称

仡佬族的族称有自称、互称与他称之分。遵义、仁怀、关岭等县仡佬族自称“哈仡”,织金县仡佬族自称“埃审”,大方普底乡、黔西县仡佬族自称“布尔”,大方青山乡仡佬族自称“濮”,普定县仡佬族自称“布告”,平坝、安顺仡佬族自称“褒佬”,六枝特区仡佬族自称“当佬”。

仡佬族内各支系间互称有:红仡佬称白仡佬为“布欧奥”,称花仡佬为“布欧挂”,称打铁仡佬为“布那舍”,称雅意仡佬为“布搓外”。披袍仡佬称打牙仡佬为“那”,篾仡佬称打牙仡佬为“夺楼娄布郎”。

彝族称仡佬族为“濮”,老彝文写作  $\text{w}$  或  $\text{m}$ ,皆音“仆”。苗族大多数称仡佬族为“克”,亦有称为“友”、“直蚩”或“嘎赫”的,布依族称仡佬族为“戎”或“布戎”。汉族称仡佬族为“仡佬”、“阁老”、“古族”、“古老户”。汉文文献里的仡佬族于唐代写作“葛僚”、“仡僚”,宋代写作“狷僚”、“狷佬”。元、明、清三代又指皆为仡佬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为仡佬族。

明、清两代,省内各地仡佬族因所处环境及社会生活的不同,族内文化差异日趋明显,汉族人口迅速增多,与仡佬族广泛地错杂而处,使仡佬族逐渐分为若干支系,对每一支系又冠以其表象特点以示区别。明代,仡佬族支系见于《炎缴纪闻》、嘉靖《贵州通志》等文献,有花仡佬、红仡佬、打牙仡佬、剪头仡佬等。清代的仡佬族支系,据《黔南职方识略》、《永宁州志》等记载,除上述数支外,又有披袍仡佬、锅圈仡佬、打铁仡佬、青仡佬、木仡佬、水仡佬、土仡佬、雅意仡佬等。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将各支系名称由来及其分布汇录如下:

花仡佬:穿“花布者为花仡佬”,在贵州前卫、平伐司、永宁州、施秉、龙泉、黄平等地;

红仡佬:穿“红布者为红仡佬”,在青山司、安平县、仁怀县、黎平府;

剪头仡佬:“女未嫁,则剪头为记”,在贵定、施秉、黄平、永宁等地;

打牙仡佬:“将嫁必先折其二齿”,在平越、黔西、安平、永宁、平远、黄平、清镇等地;

锅圈仡佬:“女人以青布束发如锅圈状”,在平远、安平、大定等地;

打铁仡佬:在平远州;

披袍仡佬:“男女衣服仅尺余,外披以袍,方而阔,洞其中,从头笼下,前短后长,左右无袖”,在平远、安平、大定等地;

水仡佬:“善捕鱼,虽隆冬亦能入渊。”在余庆、镇远、施秉、永宁等地;

土仡佬:“披草衣”,在威宁;

雅意仡佬:在永宁州。

上述诸称谓中,打牙仡佬与剪头仡佬实为同一支系的不同称呼。乾隆《贵州通志》说,打牙仡佬,“将嫁必先折其二齿”,又“剪前发而披后发”。故《大定府志》谓“打牙革老一名剪发革僚”。金沙县白仡佬、普定县的苗仡佬、大方县的彝仡佬、六枝特区的马头仡佬、六枝、水城等地的箐仡佬等则未见于文献。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贵州许多地区仡佬族的民族语言、服饰和习俗多已消失,仡佬族若干支系的称谓亦不复存在。现今能按支系区分的只有红仡佬、白仡佬、青仡佬、打铁仡佬、打牙仡佬、雅意仡佬、披袍仡佬、剪头仡佬、箐仡佬、彝仡佬、苗仡佬 11 个支系。各支系的分布区域也有所变化:红仡佬主要在仁怀、黔西、大方、关岭、晴隆等地;打牙仡佬主要在普定、织金等地;披袍仡佬主要在平坝、安顺等地;打铁仡佬主要在大方、六枝、水城等地;雅意仡佬主要在织金、黔西等地。

《炎缴记闻》载,仡佬“各有族属,不通婚姻”,婚姻关系是在同一支系中进行,不同支系间,从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罕有姻亲关系。

### 第三节 语 言

#### 一、古僚人语词例证

濮和僚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曾是今天仡佬族的先民。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语言,直保留至今,文献上发现的古僚人语词不多,但与今天仡佬语加以对比,有助于证实仡佬族的族源问题。

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述:“永昌郡……有兰干细布——兰干,僚言纒也。”《后汉书·西南夷传》中也有“兰干细布”之说,这是记载僚人语词最早的材料。嗣后,《北史》、《通典》等书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述。

今日普定、镇宁仡佬语称麻为 la<sup>33</sup>;晴隆、隆林称为 lie<sup>33</sup>;平坝、安顺称 lun<sup>31</sup>,同语群的麻江木佬语称 lu<sup>13</sup>,它们都是同源词。六枝牛坡仡佬语称火麻为 lia<sup>13</sup>pue<sup>33</sup>,称苕麻为 li<sup>13</sup>kei<sup>13</sup>。汉字对音为“兰格”,与晋代前后的“阑干”极为相近。“阑干细布”即用纒麻织成的细布。

《魏书·僚传》记述:“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暮、阿段’、妇人称‘阿姨’、‘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语也。”

今日普定仡佬语称男子为 a<sup>31</sup>tau<sup>13</sup>或 ko<sup>31</sup>tau<sup>13</sup>,平坝称丈夫为 qo<sup>33</sup>tau<sup>55</sup>,少数人也称 a<sup>33</sup>tau<sup>55</sup>,汉字对音为“阿道”;安顺仡佬语泛称妇女为 zua<sup>13</sup>,普定仡佬语称为 a<sup>31</sup>za<sup>13</sup>,汉字对音为“阿牙”。与“阿段”、“阿姨”相近。

《魏书·僚传》还记述:“僚者……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依其家之数。”《通典南平蛮典》记述:“南平蛮,北与涪州接,部落四千余户……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兰’。”《太平寰宇记》中昌州风俗条下记述:“昌州风俗,无复风,有僚风。

悉住竺箬,悬虑杨屋,号称‘阁’。”“干兰”、“阁阑”实为汉字拟音之不同,所指则为同一事物。

与今安顺仡佬语称“房子”为 qlue<sup>33</sup>,为复辅音的单纯词其汉字对音为“各勒”与“阁阑”十分相近;平坝仡佬语中“房子”为 ke<sup>33</sup>，“绿”、“青”两义为 lan<sup>33</sup>,ke<sup>33</sup>lan<sup>33</sup>是“绿色房”的意思,其汉字对音为“改兰”;与“干兰”之音也很接近。

唐代大诗人杜甫居川东夔州时,曾有过一段营田的生活,从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中看出,他曾雇用年轻的僚人为奴婢。他在《示僚奴阿段》一诗中有“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之句,他把“僚奴”比“胡奴”,证明他也知道男仆和女婢都是异族的僚人。从《秋行官长望督促东者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一诗的标题中看得更清楚。“阿段”如前所述,是男青年的泛称,“阿稽”则是女青年的泛称。

普定新寨和镇宁凉山的仡佬语称“姑娘”和“女儿”为 ma<sup>13</sup>təau<sup>13</sup>或 a<sup>33</sup>təu<sup>33</sup>;汉字对音为“阿娇”或“阿九”;六枝牛坡仡佬语称“姐姐”为 a<sup>55</sup>təai<sup>35</sup>,汉字对音为“阿界”,这与杜甫称为“阿稽”在读音上是很相近的。

《新唐书·南平僚传》,对僚人有如下记述:“……俗喜叛,州县抚视不至,必合党数千人持挑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前后植旗。”

“婆能”这个音在今天仡佬语中是个带复辅音声母的单纯词。平坝的 mle<sup>33</sup>是“王、帅”的意思,普定的 mle<sup>53</sup>是“鬼”的意思,六枝的 mlw<sup>31</sup>是“灵魂”、“厉鬼”的意思,安顺的 mplə<sup>44</sup>是“鬼”、“王”的意思。这些词与“婆能”的音都很接近。

南宋诗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记述:“僚……元首长,版籍……无年甲姓名,一村中惟有势力者曰‘郎火’,余但称‘火’。”范氏当年记述的当是岭南僚人的情况。今天只有广西隆林的三冲和大水井还有少量仡佬族居住,但这两地的语言中找不到在音义上与“郎火”有联系的词,但在贵州仡佬语中却找到了答案。安顺黑寨一带的仡佬语中 la<sup>31</sup>是“地方”的意思,xe<sup>35</sup>是“帅”、“匠”意思,构成合成词后有“师父”、“寨老”、“头人”等义。la<sup>31</sup>xa<sup>35</sup>的汉字对音与“郎火”相近。“火”这个词范成大认为是一般“人”的意思。今天仁怀、遵义、关岭、晴隆等地的仡佬语称“人”都是 hen<sup>33</sup>,同族群中的拉基语为 hu<sup>55</sup>,它们的汉语音与“火”相近。

## 二、仡佬语的现状

1982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贵州仡佬族人口有51 000多,在尔后的几年里,对该语言进行了较广泛的调查,本民族群众能完全用母语进行交际的约有三分之一,即17 000人左右,部分能用母语进行交际的约10 000人左右。其余的人则用第二母语进行交际。1983年以后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根据政策,恢复了20多万人的仡佬族民族成分。新恢复的仡佬族主要在黔东南地区。目前仡佬族语言的覆盖面,即有三种类型。

### (1)仍使用母语的地区。

全国仡佬族语群分布的面较广:东到贵州的铜仁地区,西到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马关、麻栗坡一带,南到广西的隆林、那坡两县,北到遵义地区的仁怀和川南的古蔺、叙永一带。在这个大面积内,今天仍使用仡佬语的仡佬族主要集中在平坝、安顺、普

定、关岭、六枝、大方等县。从全国来看,这几个县恰在仡佬族分布的中心地带,从古夜郎国的疆域来看,这几个县恰巧也在中心。平坝县高峰区活龙乡的大狗场村如今有近百户,约500人口,在日常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全用母语进行交际,有部分从汉族、布依族、苗族嫁进来的媳妇,在两三年内也能完全掌握仡佬语。其次如关岭麻凹梧桐树,安顺的弯子寨、黑寨,普定的新寨,六枝的居都寨,大方的园门口寨以及晴隆的山背后寨都还熟练地使用本民族语言。

### (2)保留部分母语词汇的地区。

能讲部分仡佬语词汇的,都是70岁上下的老人,据他们回忆,在他们青少年时,周围的人都还能用母语交谈、唱歌,算起来母语急剧的弱化,只有约五六十年的光景。这种现象的典型地区是黔北的仁怀县和遵义县。根据1988年5月的实地调查,两县竟找不出一个能全说仡佬话的人。仁怀县茅坝区安良乡92岁的勾文珍(女)老人记得最多,只讲出111个常用词,板栗湾小岔70岁的王德仙,只会讲26个常用词;遵义县枫香区平正乡72岁的山国河能讲72个词,同一个乡田坝村68岁的李绍华会讲34个词,61岁的吴安碧(女)最年轻,只会讲25个词。这5个老人中,勾、李、山讲的是所谓青仡佬语,王、吴讲的是所谓红仡佬语,尽管方言土语不同,但在母语发展的进程上都处在同一阶段。

此外,织金县龙场区熊寨乡桥上村的罗关华和潘以珍以及黔西县沙窝区罗家坪的赵新芝等也能讲部分仡佬语词汇,他们的年龄也都在70岁以上。

### (3)不会使用母语的地区。

1983年后返本归源的黔东北地区人数众多的仡佬族都已不会讲仡佬语,他们主要居住在务川、道真、正安、石阡、江口等县仡佬族分布的中心地区。也有完全丧失母语的情况,如安顺县旧州区的黄腊乡,现有112人完全不会讲仡佬语;清镇县有仡佬族3000多人,现在几乎全都不懂母语;大方县青山、白岩、施黎3个民族乡中仡佬族人口超过千人,但无一人懂本民族语言。在丧失母语的广大地区,仡佬族人民熟练地使用第二母语。除黄腊乡使用布依语和白岩乡部分人使用彝语外,其他各县区都使用汉语。

仡佬语逐渐衰落的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近代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歧视和限制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繁荣,交换频繁,人们需要一种市场通用的语言;三是汉族文化的长期影响(包括语言、文字);四是多民族杂居,共同的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促进了各民族间互相学习语言的事实;五是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一个家庭难以使用一种语言。因而,逐渐导致母语的解体。

## 三、仡佬语的方言、特征和系属

历史上仡佬族的先民,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乱与迁徙。同一语言的人群,没有可能始终团聚在一个地区内。导致今天方言分歧很大,并呈现犬牙交错的方言土语图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语音系统、词汇构成和语法特征,仡佬语可分为四个方言。黔北方言以仁怀、关岭为代表,这个方言的仡佬族自称“哈给”ha<sup>55</sup>kei<sup>53</sup>,主要居住在遵义、

瓮安、镇宁、关岭、晴隆、贞丰和广西隆林的三冲等地；黔中方言以安顺、普定为代表，安顺的仡佬族自称“德佬”(tjau<sup>55</sup>)，普定则自称“告”(au<sup>13</sup>)，主要居住在平坝、织金、六枝等地；黔西方言以大方为代表，他们自称“补尔”(pu<sup>55</sup>u<sup>55</sup>)，主要居住在黔西、清镇、织金和镇宁等地；黔西南方言以六枝为代表，他们自称“多洛”(to<sup>31</sup>lo<sup>55</sup>)，主要居住在水城、织金和遵义的尖山等地。云南省麻栗坡、马关等地的仡佬族也讲这种方言。

一个县往往不只是一种方言。如：织金县的龙家寨属黔西方言，牛洞属黔中方言，阿弓属黔西南方言，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花江属黔北方言，凉山属黔北方言，比拱属黔西南方言。一个方言内部各地的话也还有一定的差别，以黔中方言为例，普定与安顺互相通话，困难很大，平坝与安顺可以顺利通话，但音、调也还有一些不同。

仡佬语具有汉藏语系语言的一般特点：语序在句子中起重要作用；有丰富的表名物和动作的量词；所有的语句一般都是主语部分在前，谓语部分在后，名词有前加成分但无形态变化等等。除此而外，仡佬语还有与其他语言不同的若干特征：语言方面有较发达的复辅音，如双唇塞边音 pl，舌尖塞边音 tl，舌根塞边音 kl，小舌塞边音 ql，鼻边音 ml 和擦边音 zl 和 vl 等；表达否定形式的手段多样，否定副词要置于句子的末尾，有补语的否定句形式较复杂；有独特的表“数”的方法；人称代词的“双轨制”助词丰富多样。结构助词尤其特殊等等。由于仡佬语独具这些特点，与仡佬族杂居的民族，很少有学会并使用仡佬语的。

仡佬语的系属问题，长期以来争论纷纷，莫衷一是。在语音系统上极近苗语，在语音、语法上有个别现象又近壮、侗语。它与苗、瑶语族语言和壮侗语族语言都有少量的同源词。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仡佬族语言自身的特点。它与木佬语、羿人语和云南拉基语有极密切的同源关系。经过比较研究，把仡佬语群看成汉藏语系中一个独立的语族比较合适。其名称可以叫僚语族或仡佬语族。

## 第二章 人口及分布

仡佬族是贵州最为古老的民族，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部分濮人和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部分僚人，曾相继是仡佬族的先民。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加强和民族关系的加深，仡佬族的区域分布和人口数量有着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变化的总趋势为分布区域日渐缩小，人口数日益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仡佬族的分布面及人口才逐渐扩展、增多。

### 第一节 人 口

秦汉时期，夜郎国的濮人人口在西南夷的各邦国中数量最多，《史记·西南夷列传》

谓,“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西汉末,牂牁太守陈立召见夜郎王时,夜郎王兴所带随从即达数千人。

西晋时,李寿自牂牁迁入蜀地的僚人为十万余户。

唐代,贵州的仡佬族称为“东谢蛮”、“南谢蛮”、“西谢蛮”、“牂牁蛮”。《旧唐书》列传一四七载,“牂牁蛮”的“户口殷盛,人力强大”、“盛兵数万人”。“西赵蛮”也“有户万余”。西堡长官司在今普定县马场区。《贵州图经新志》卷八载,“西堡长官司部落皆仡佬”。

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 1395 年),西堡长官司仡佬族人民在反抗官府中,有 5 326 人遭擒杀。成化十四年(公元 1478 年),西堡仡佬族有万余人再次举行起义。

民国 26 年(公元 1937 年),平坝大狗场仡佬族人口为 568 人,当年死于霍乱病者达 238 人。1914 年,德国女民族学者拉克克《在中国西南部族中》说,仡佬族“接近于绝种”。清代和民国年间,仡佬族人口锐减,除兵衅、灾荒、瘟疫等原因之外,仡佬族社会地位低下,一批人自动改族换姓或通过婚姻关系改变族别也是重要因素。

1949~1982 年全省仡佬族人口表

年份	1949 年	1953 年	1964 年	1982 年
人口数	12 148	20 516	26 198	51 521

1953 年、1964 年、1982 年仡佬族人口分别占全省人口数的 0.14%、0.15% 和 0.18%。

1982 年,仡佬族人口中有 54.42% 为文盲及半文盲。在文盲半文盲中,女性所占比例大,为 74.12%。文化程度每千人中所占比例见下表: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260.28	79.40	13.33	0.89

仡佬族中 95.64% 人口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为 1.31%,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为 0.14%,党政企业负责人为 0.57%,专业工人为 1.51%。

经过民族识别,大批仡佬族人返本归源。以 1986 年计,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为 84 875 人,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为 75 121 人,石阡县为 69 821 人,正安县为 2 万余人,思南县 3 300 人,江口县 700 余人,松桃苗族自治县 200 余人,新增的仡佬族人口共 25 万余人,全省仡佬族总人数达 30 万以上。

平坝县大狗场村,是仡佬族的一个聚居点。地势平坦,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1985 年有 95 户 452 人。大方县红丰村是仡佬族的另一聚居点。地处高寒山区,农业以种植包谷为主。1985 年有 71 户 323 人。两村皆通行本民族语言,两村的文化程度及职业结构比较如下:

项目 村别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县、区 乡干部	教师	工人
大狗场	141	76	18	4	20	12	6
红丰村	31	2	1	0	0	1	0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省仡佬族人口为43.06万,在9个地州市的具体分布为:贵阳市2200人,六盘水市10566人,遵义地区275385人,铜仁地区95287人,毕节地区20860人,安顺地区21003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778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099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3341人。其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为:

学别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百分比	41.2	15.57	3.36	0.46

这一时期仡佬族人口的从业结构是:

业别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百分比	92.15	1.89	5.96

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贵州仡佬族人口达49.4万。主要聚居于黔北,其中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为145989人,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为112025人,正安县为31706人,凤冈县5982人,仁怀市4347人,遵义县2922人,余庆县2338人。

## 第二节 区域分布

### 一、古代分布区域

《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9世纪楚国的先君熊霜卒,三弟兄争立。其中,叔堪败逃,曾“避难于濮”。刘伯庄注谓,“濮在楚西南”。孔颖达疏《左传》文公十六年时说,“濮为西南夷也”。《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武帝遣唐蒙通夜郎,斩夜郎王而设牂牁郡,导致“夷仆阻城”迫使武帝封夜郎王的三子为侯。

贵州,古为西南夷中的南夷,位于楚国的西南方,夜郎牂牁郡的主体均在贵州境内。西周至秦汉时期的仡佬族先民濮人都居住在贵州境内。

魏晋南北朝时,仡佬族的后期先民僚人广布于今贵州全境,《博物志·异俗篇》载,“荆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其中,许多僚人因政局动荡和掳卖风的盛行,大量被迫外移。《蜀鉴》卷四引《益州志》谓,李寿统治南中时,“从牂牁引僚入蜀境”,使这批

入蜀的僚人散居于今川中、川南一带。南北朝时的益州，辖及今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北史·蛮僚》载，镇梁、益二州的官员，带“出兵讨之，获其牲口”，将掠俘得的僚民变为僮仆或低价卖与商人，让其高价转卖至内地。

唐宋两代，《新唐书·南蛮》、《文献通考·四裔》等载，夷州（在今凤冈、湄潭、余庆、绥阳一带）、费州（在今思南、德江、凤冈等地）、思州（在今务川、沿河、德江、印江一带）、播州（在今遵义、桐梓、绥阳等地）、珍州（在今道真、正安一带）等经制州及充州（在黔东北境）、应州（在今都匀一带）、庄州（在今惠水、龙里、贵定等地）、矩州（在今贵阳境）、牂州（在今瓮安、余庆境）、琰州（在今黄平、福泉、施秉等地）、蛮州（在今开阳）、明州（在黔西南境）等羁縻州以及牂牁（在今毕节地区）、罗殿（在今安顺地区）、自杞（在今黔西南境）诸小国境有僚人居住。

据（嘉靖）《贵州通志》、《黔记》、《炎缴纪闻》、《思南府志》、《贵阳府志》等记载，明代仡佬族分布在思南、思州、遵义、黎平诸府，普安州、镇远县、赤水、普定、平溪数卫，贵州宣慰司、新添葛蛮安抚司、水东、西堡、青山、苗民、八舟、曹滴、平伐、把平、杨义等长官司境内。据《贵州志略》、《黔南识略》等所载，清代中叶的乾隆、嘉庆年间，仅贵州、铜仁、镇远、郎岱、镇宁、贵定、普定、永宁、清镇、安平、平越、余庆、大定、平远、黔西、威宁、桐梓、仁怀、正安等府州厅县之内有仡佬族。明末清初，遵义府属仡佬族为避战祸，有的迁往滇东南的富宁、广南、文山、麻栗坡、马关等地，有的移入桂北的隆林各族自治县。

### 二、近现代分布区域

光绪年间成书的《黔南职方纪略》载，清末，贵州仡佬族分布在贵阳、修文、安顺、郎岱、永宁、普定、清镇、大定、黔西、普安、余庆、镇远、遵义、桐梓、平远、水城、安平、仁怀等府厅州县内。

民国年间，仅遵义、仁怀、金沙、织金、黔西、清镇、平坝、安顺、普定、镇宁、贞丰、关岭、晴隆、六枝、水城、大方等境内有仡佬族居住的记载。1万多仡佬族人分散在十余县内聚族而居，呈点状分布，即同一县内的仡佬族村寨之间，大都相距数十里上百里，处于隔离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尤其经过1983年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发现除上述16个县以外，松桃、纳雍、石阡、思南、江口、务川、道真、正安、岑巩、绥阳、凤冈等地均有仡佬族分布。务川、道真、正安、石阡等地仡佬族村寨大多连境而居。

### 三、自然环境

仡佬族及其先民起初大都居住在群山之间的一处处平畴、谷地上。明清以后，随着封建王朝对贵州统治的加强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除安顺、平坝、清镇、仁怀、遵义等地的少数民族村落外，大部分日渐退居边远山区，即俗谓“高山苗，水仲家（布依族的旧称），仡佬住在石旮旯”。仡佬族的住地，大多交通不便，地少而土瘠。

## 第三章 社会经济

仡佬族是一个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农业都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仡佬族的冶炼业颇为突出,历史上长期占有显著地位。仡佬族的纺织业独具特色,有的产品在省内享有盛名。

### 第一节 社会经济制度

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发掘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的墓葬 226 座。许多墓葬有铜釜、铁釜、铜鼓、铜罐及铜铁刀、剑、戈等随葬物。少者 1 件,多者 10 件,最多者 30 余件。约 40% 的墓葬无随葬品,反映出仡佬族先民贫富的分化和阶级的对立。在此期间,贵州境内出现夜郎、且兰、漏卧、鳖等王、侯、君长。《史记·西南列传》载,贫者“谒见贵人,皆执鞭而拜”,贫穷人家无力陪嫁女儿,常被迫卖与富贵人家当婢女。土地为领主所有。广大仡佬族群众为依附于领主的田丁。《文献通考·四裔》载,南平军(辖今贵州松桃)李光吉、梁秀等三家领主各拥有数千家田丁,甚而凭借权势,逼迫附近一些汉户“纳身”。他们占据大量田土,其田产被官府没收后,招民耕种,年可收租 3 万余石。世居播州的杨氏有庄园 48 座。明代,土地归土司世袭所有。《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 108 载,土司“子孙代爵土”。《思南府志·后序》载,思南宣慰司辖区内的土地“俱属宣慰氏私庄”。水东土地亦为宣慰使宋氏“庄田”(《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114)。耕种者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土司经营的田土称为“官庄”或“私庄”,又名“公土”。土司划给属官作为俸禄的田土称为“头人庄田”或“私土”。仡佬族人民以“马田”、“猪田”、“鸡田”、“柴火田”、“被窝田”、“客田”等名称领种田土,分别替土司养马、养猪,向土司交鸡、交柴火,为土司嫁女娶媳时背被子,供应土司派来催收粮赋者的钱粮等作为领种土地的代价。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 1413 年)开始,至雍正年间(公元 1723~1735 年)为止,通过“改土归流”,思州、思南、普安、播州、水西、金筑等大土司及许多小土司被废除,土司对土地的世袭所有权亦随之取消,土司辖区的土地由官府招民占佃,如《平播全书》卷 6 所言,“另行招人承种,纳粮当差”,“付给印契”。未被改流的小土司,也因权势的衰落,日渐穷困。如《安顺府志·王燕传》所言,“土司卖田与绅商”,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明中叶以降,由于卫所屯田制的松弛,大量屯军散逃,军队屯田大多荒芜,谢东山的《屯田议》建议“招佃于人”,官府渐将一些无人耕种的屯田,分租于民耕种,侨居贵州的汉族绅商“买田宅,长子孙者盖多有之”(嘉靖《贵州通志》卷 3),成为新兴的地主。清代,除于“苗疆”新行屯田外,明代卫所屯田制度被废止,《清实录·世祖实录》载,“黔省军田许照民田

一体买卖,每亩上税银五钱,给契为业”。自明代中叶起,以土地买卖和实行租佃制为特征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渐渐兴起,至清代已基本取代土司所有的封建领主制。仡佬族人成为汉族地主的帮工、佃户。《明史纪事本末补编·西南郡蛮》载,“仡佬苗……其熟者善佃种,居人庄屋”;《黔南职方纪略》卷5载,“仡佬……依旁汉户而居,佣佃营生,均无田土”,“仡佬……散居各寨,为汉户佣工,并无产业”。

民国时期,基本上没有地主的仡佬族人,以实物地租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地租一般是以对半分,少数为四六分成,即地主得六成农民得四成。有死租与活租两类,前者是定额租,后者系按当年产量分成,尤以后者为普遍。大定、黔西等地耕种土目田土者,除缴纳实物地租外,还保存着领主制时期的劳役地租。劳役的名目繁多,除每年要替土目无偿地耕种田土50~80天外,土目家背粮、运煤、建屋、办婚丧事等,仡佬族佃户皆须无偿效劳。农民向地主租地,有的地主怕佃户交不起租或“赖租”,还勒索押金。押金以银钱计或以房屋、牲畜等作抵押。押金额大,按所租土质好坏索取的押金相当于当年地租额50%~200%。仡佬族农民终年耕耘收入,绝大部分用以交租和应付政府的壮丁费、修路费、房租税、户口税、屠宰税、子弹捐等苛捐杂税后,所剩极微,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常为疾病所困扰。民谣谓:“大斗收,小斗放(指放债),包谷饭也吃不上。”《贵州通志·风俗志》载:“一生无被,终岁衣缕,头是布巾,足惟草履。夏炎日、冬履霜,陟岭穿林,冲风冒雨,一染寒病,比户不休。”仁怀县安良乡仡佬族穿棕衣者达40%,刚树清全家大小穿棕衣,冬天围炉烤火。火燃棕衣,两小孩被活活烧死。广大仡佬族农民常外出帮人做短工,当挑夫。江口县槐风村仡佬族,农闲时多砍木柴挑下山进城出卖,买回粮盐添补半饥饿生活。平坝县大狗场仡佬族男子过完正月十五,相继外出,或给地主干活,或背沙锅到贵阳卖,或到青岩碗厂做临工。仁怀县安良乡、遵义县平正乡仡佬族农民于农闲时给商人、资本家背运盐、酒,将川盐和茅台酒背至遵义城,须经仁怀的蛮子坡(在五马),坡路长达5里,冬季坡脚晴朗,坡上却冰封,身背130~170斤重货物的仡佬族人,艰难地一段(称为一等)一段行进在崎岖的羊肠小道,发出“头等二等是个名,爬上三等累死人”之慨。大方县瓢儿井是黔西川盐的集散地。《贵州通志·风俗志》载,当地贫苦仡佬族人无论老少,多加入运盐队伍,“幼者十一二三,老者五六十,无不以负盐为业也。数步而肩换,三里而息喘”。他们用篾背筐背着沉重的食盐,世代往返于川黔崇山峻岭中的石块道上。沿途歇气时,用拐扒子(一根二三尺长的木棍穿入半月形的平木块中,下端削尖包以铁皮)支撑背筐时所戳磨的一个个印痕,至今还保留古道之上。仡佬族人极难吃上食盐。生活在大方县白纳区普底高山地带的仡佬族人,以7斤包谷换盐1两;1头猪崽换盐2.3两;1头黄牛换4.5斤,马1匹换10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1952年,全省分批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仡佬族人民都分得了土地。1953~1957年,由互助组经初级农业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社,实行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至1958年跃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1960年,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政策。1980年起,逐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促进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发展。

##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发展

### 一、农牧业

仡佬族地区自然条件复杂,有山地、高原,也有丘陵和盆地;草场分布广,多系零星小面积;热量丰富,除黔西北日均温度为零度以上的有300天外,其余河谷地带均在360天以上;雨水充沛,降雨量超过蒸发量,复杂的地貌、气候,有利于农业发展。战国至秦汉时期,仡佬族先民的生产即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汉书·西南夷传》载夜郎国“耕田、有邑聚”。粮食作物主要是稻粟,畜养的牲口以牛羊为多,当不听朝廷的夜郎王被诛杀后,勾町、漏卧等邦国首领曾“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使用的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铜器和铁器。赫章可乐及普安铜鼓山遗址中,出土有石刀、蚌刀、骨铲、骨镰,可乐墓葬中出土的还有铜锄、铁铲、铁插、铁铧等农具及稻谷、大豆等粮食作物。清镇、平坝西汉墓中也出土有铁插、铁锄,并有鸡、狗、兔、牛等陶制模型。兴义市万屯、顶效东汉墓中出土陶制稻田、水塘模型。

经济作物,以黔北的茶为著名。《茶经》谓:“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唐宋时期,这一带的茶作为常赋缴纳。务川的都濡茶,宋代诗人黄庭坚以“都濡春味长”,“味殊厚”为赞。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地区已由锄耕农业发展至犁耕农业,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刀耕火种阶段,畜养的牛马数量中不多,却被征派外调。《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牂牁郡“畚山为田”,“寡畜产”出“耕牛、战马”补充蜀汉生产及军事所需。

唐宋时期,仡佬族的农业生产仍以刀耕火种形式为主,但有的地区能“稻粟再熟”(《新唐书·南蛮》)。务川一带的平衍区,水田农业较发达,唐初,特以多田作县名(《太平寰宇记》卷121)。牂牁地区“土宜五穀,多种秧稻”(《宋史·蛮夷》)。穀稻是人工培育的一种植株较矮、不易倒伏、耐寒、米质粘性较强的新种即粳稻。有余粮者还以之酿为酒,备节庆时饮用。牛马牲畜普遍作为财富的标志,以之作为陪嫁及赏罚手段,“婚姻之礼,以牛酒为聘”,“有功者,以牛马铜鼓赏之”(《旧唐书·西南蛮》),“杀人者,出牛马三十”(《新唐书·南蛮》)。播州首领杨灿,于嘉定十二年“输马三百”匹给四川安抚使安丙(《贵州通志·前事志》)。

元、明、清时期,在汉民族的影响推动下,仡佬族农业普遍使用牛耕。安顺仡佬族谓犁田为“赖揉”。平远州的仡佬族“多铸犁口营生”(乾隆《贵州通志·苗蛮》)。黔西北地区仡佬族所铸小犁口,长约3寸,供彝、苗、仡佬等各族耕种山地用。普安州“犁田以一牛三夫”,一人牵牛于前,一人赶牛在后,一人紧压犁柄(《普安州志》卷22)。注意兴修水利,引水灌田以保产。真州巡检坝,凿8寸宽、5寸深石枳一条,长约3里,引龙洞水可灌田150亩。西堡长官司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开修官沟一条,长约4000米,宽1.5米,深1米,盘旋于群山之间,至今尚完好,可灌田700亩。粮食作物种类增加,西堡长

官司原种红稗、小米、粘谷,包谷引进后,人们竞相种植,“数年之间即普种于西堡”(《安平县志》卷4)。黔北地区“荞之类三”,仅荞即有花荞、甜荞、药荞(苦荞)之分(《遵义府志》卷16)。黔中地区,到了清代所种稻谷,除有水稻、旱稻、粘稻、糯稻之分外,还有早谷、晚谷、红谷、羊毛谷之别。豆类品种也繁多,有黄豆、绿豆、茶豆、豌豆、蚕豆、扁豆、饮豆、豇豆、四季豆等(《安顺府志》卷17)。由于犁耕田地,“杀牛祭祀”(《贵州图经新志》卷12)和“婚嫁论牯牛,大者为上”或“婚嫁以猪羊为礼”(嘉靖《贵州图经新志》卷3)、“妇人以羊毛缀线成衣”(《安顺府志·地理志》)等生产生活的需要,饲养业中,牛、羊、猪为主要家畜。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西堡长官司仡佬族反抗斗争遭镇压后,官兵一次就掳“获兵器、牛羊数千”(《明实录·宪宗实录》)。在边远山区,“梯山为田,烧箐为地”的粗放耕作比较普遍(《平远州志图说》)。在农耕、放牧之余,还进行渔猎作为经济生活的补充。新添卫的“仡僚以耕猎为生”(《贵州图经新志》)。清平县的仡佬“种山射肉为生”(《明史纪事本末·补编》)。真州的仡佬族中许多人于明朝中叶尚“咸以渔猎为生”(嘉靖《贵州通志》卷10)。大定府的仡佬族妇女“女捞虾蟹供食”(《贵州通志·土民志》)。花仡佬则“好猎逐罗雀为事”(《贵州地理志》)。

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仡佬族人民根据作物生长规律,总结出作物栽插的时序是:冬季翻土、整地;春季犁地耙地;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栽包谷,三月上旬撒秧;四、五月内栽秧;夏至薅头道,大暑薅二道。还通过天象观察,试测天气;太阳出得晚,当天晴得长;太阳早出呈红色,当天晴的时间短;久晴日晕则有雨;夏天云入大坡或白朵朵将有冰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仡佬族人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府扶持下,发挥互助合作优势,农业生产得以发展。大量垦荒,耕地面积增加,耕牛增多,水田普遍二犁二耙,干地三犁三耙,地里作物多行套种。1958年的深耕密植“一平二调”使农业生产遭受挫折。70年代起较广泛地推行新品种和加用化肥,常以尿素作追肥。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出现较大发展。织金县龙场区牛洞仡佬族人1954年于河道旁开沟引水使干河坝变为田40多公顷,因连年受洪水水淹沙壅而无收。1969~1979年,政府拨款6万元,大队出劳力修通长570米、高宽各2米涵洞一口,全部改为保收土,用以种包谷、黄豆、小麦、洋芋和油菜。松桃苗族自治县普觉区仡佬寨,解放前,粮食作物中有荞子、鹅掌(红稗)和红薯等杂粮。鹅掌有如小米、红稗,壳硬质粗、味差,俗谓“不上高山不晓得平地,吃了鹅掌才晓得粗细”。解放后,因荞子、鹅掌质劣、量低而弃种。红薯于插完秧后栽种。打巢一个栽薯藤一根,巢距5寸左右,25天后薅,立冬后收藏。1956年,引种花生,先用桐油饼或磷肥裹花生种,于清明下种,十余天即出芽,四月薅草,五月开花,八月成熟,白露一过即可拔收。80年代以杂交包谷取代二黄早包谷,以新种包谷套种花生,取代老种包谷套黄豆。原种高秆汕稻,亩产四五百斤。70年代改种珍珠矮,亩产七八百斤。80年代再改为威优稻,亩产500~600公斤。仁怀县安良乡,“土改”前平均4~5户有1头耕牛;集体生产时期,平均3户1头耕牛;80年代,平均2户有耕牛1头。政府以民族经费3000元补助购化肥,以5000元发展经济林,以5000元补助电灌。70年代引种柑橘,1982年有橘2万株,每株均产50公斤。80年代始种烤烟,1985年有烤

烟 10 余公顷,单产 145 公斤。种茶 2 万窝,年可采茶 3 次,每窝可提茶 0.5 公斤。回销粮由年 2~3 万公斤减至 1985 年仅 5000 公斤。由二分之一人家杀年猪到 347 户人家中仅 50 户未杀年猪。正安县石井乡,“土改”时人均 9 分地,80 年代降为人均 6.8 分,因以贵朝二号稻种及杂交包谷替换等泡齐、二反早等老品种,使原亩产 250 余公斤水稻、100 余公斤包谷分别提高到 400 公斤和 250 公斤左右,并在 1985 年严重旱、虫、鼠灾下夺得丰收。年收桐籽 10 000 余公斤,乌桕籽(俗称卷籽)150 万公斤。1957 年引进油茶良种,80 年代增产,从 1982 年的 50 000 公斤增至 1986 年的 75 000 公斤。1966 年引种柑橘,十年后始收,1986 年收橘 100 000 公斤。石阡县仡佬族重视选择良种,认为广种良种是增产的关键,民间农谚谓“挑粪肥田,不如换种一年”、“良种年年选,增产无止点”、“选种怕费力,一穗几粒粒”、“三年不选种,天都扯不拢”。1988 年,石阡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拨款 10 000 元购汕优六三、威优六四、威优六三等良种,在花桥、石固、龙川等区推广,在旱灾袭击下夺得丰收,石固乡 53.4 余公顷田土的稻谷增收 11.3 万斤,并培养出 216 名良种技术人员。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70 年代起改造耕地,搞土变田、坡改梯、瘦改肥,至 1986 年止,将 4 002 公顷中低产田土实行改造。80 年代后,耕牛分户饲养,取消生猪派购任务,在商品经济刺激下,畜牧业发展很快,1986 年,牛的存栏数达 53 935 头、猪 195 872 头、羊 35 015 只,分别比 1949 年增长 72%、7.4 倍和 18.4 倍。淞江是有 8 000 人口的仡佬族乡,人均耕地不足 0.07 公顷,是人多地少的山区。1979 年以前,生产靠贷款,吃粮靠回销。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提高了人们劳动生产的积极性。1987 年,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 861 公斤,比 1980 年提高 25%;生产费开支占总收入 20.4%,比 1980 年下降 6.1%;出售给国家粮食 25.7 万公斤,粮食商品率为 21.3%,1987 年提高 9.8%;人年均纯收入 438.80 元,比 1980 年增加 250.50 元。由农业单一经济向多种经济发展,全乡劳动力除主要投入农业生产外,还经营副业、建筑业等其他经济行业。玉溪镇洞口寨仡佬族农民韩真奇因地制宜,1980 年起在自留山、责任山和屋前屋后广种五倍子树,进行科学管理,年年增产,1980 年摘收五倍子 75 公斤,收入 130 元,到 1983 年摘 300 公斤,收入 1 400 元,占全家经济总收入的 32%,并带动本寨 15 户农民发展五倍子生产,1983 年全家卖给国家五倍子 850 余公斤(干)。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韩真奇“森科户”三等奖,获地区先进生产者称号。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七五”、“八五”两个五年计划期内,由于杂交玉米、杂交水稻、玉米地膜栽培、水稻两段育秧等优良品种、实用先进农业技术在全省各地的推广,仡佬族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从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得以较大较快的发展。比 1987 年农业科技的推广,在抵御自然灾害上也起到重要作用。

道真原属正安县。民国 20 年(公元 1931 年)正安县县长黄德全在其呈报该县上年旱灾造成的惨状:“去岁又饿三分之一。兼之入秋以后,天久不雨,遂玉米价飞腾,一日千里,不惟贫者有饥寒之忧,即富者亦呈恐慌之象。以是,野无过草,民鲜盖藏,以树皮草根充饥者有之,以蕨叶、白泥果腹者有之。甚至夫僵海角,妇气天涯,老弱者转于沟壑,

少壮者散之四方……灾民之多,已达二十余万口,灾区之广,几遍九百余里,实属亘古所未有。”60年代后,在此同一区域,又遭到更严重的干旱。但在党的领导下,推广科学种田,并大力组织抗灾,顶住了灾害的袭击,生活稳定,社会秩序井然。中共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县委在县发(90)18号文件——《关于今年夏秋之际旱灾情况的紧急报告》中写道:“七八十年代未见过的高温天旱,溪河断流,塘库干涸,七月降雨量为78.8毫米,比平均降雨量少50毫米。蒸发量高达188.6毫米。八月降15.3毫米,蒸发量为234毫米。全县大秋作物受灾面积达86.7%,粮食总减少32.7%……因地膜玉米达2534.6公顷,玉米苗移栽7万亩,水稻两段育秧和杂交良种推广的占总面积95%以上。支农款达12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故粮食歉收仅2~3成。未实行科学种田者,则减产4~5成。”新的社会制度及科学种田的推广,与旧社会传统农业相比较,其优越性得以突出的显示。属于贫困县的务川大力实施“温饱工程”,推广实用农业技术粮食单产提高,总产上升,贫困人口逐年下降。在30348.5公顷耕地大体不变的基础上,粮食产量逐年增加:1958年为7.5万吨,1991年为10.3万吨,1994年为11.3万吨,1995年达11.8万吨。贫困人口则从1985年的18万降至1991年的4万,再降至1995年的3.5万。1995年全县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40公斤,人均纯收入597元。1996年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民人均收入789元,人均占有粮食394.7公斤。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民人均收入已达921元,人均有粮356公斤。收入的增加与发展烤烟种植有关。道真、务川两县土壤多为酸性,日照长,霜期短,常年气温在15℃左右。80年代始种以来,采用G—28、红花大金元NC82、K328优良品种,标准厢育苗、塑料薄膜育苗、合理施肥、科学烘烤等先进技术,所产烟色黄、味纯、易燃、含油丰、杂质少、刺激性小。1981年评比中,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烤烟质量为全省第一,贵州、北京、上海、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24省(市、区)来此调用。1983年进而评为全国第一,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被列为全国优质烤烟基地县。1996年种植烤烟8264.1公顷,实现烤烟特产税2100万元。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5次被评为全省烤烟先进县。1996年,务川产烤烟1.67万吨。烤烟生产的发展给仡佬族农民增加了收入,成为两县的支柱产业,烤烟生产税均占两县财政收入的60%以上。

边远山区的一些仡佬族村寨,交通不便,土少地瘦,水源不足,资金缺乏,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劳动力未能多向应用和充分发挥,仍沿“半年辛苦半年闲”的旧习,抵抗自然灾害能力弱小,人畜饮水问题尚待解决,有的人户还未解决温饱。自然条件较好的仡佬族聚居点之一的平坝县大狗场,在实行生产责任制前,属于“三靠”队,即吃粮靠回销,发展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每年3月份起,即有50%人户缺粮,至青黄不接时,缺粮户达86.7%。1982年,全寨每人平均欠贷款56元。军属陈素珍,其夫何昌平系志愿军,转业后为大队党支部支委,1979年病逝,有子女6人,长子何在洋于自卫反击战中立功,现役军人何在洋有妻及2女孩,三代10人住在两间破屋内。1981年收获20石谷子(每石100斤),过完春节即缺粮,且欠集体生产时的贷款500元。江口县槐风村的仡佬族散居山上,共35户221人,每人耕地不足一亩。无水源,夏季饮“雷公井”——天然水函,